

峥嵘岁月

——参加海子游击大队前后(下)

□喻平

反“围剿”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宣告了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部分国民党残兵败逃入西南。当时,贵州的反动派,听到海子暴动的消息,如坐针毡,妄图扑灭海子游击队于摇篮之中。他们汇集了盘、普、兴(仁)、兴(义)四县的保警大队和国民党三二八师的一部分兵力,分两路进攻海子游击根据地。王进之在兴仁得到情报后,连夜派人送来消息,一场严峻的斗争开始了。

翌日凌晨,坪上指挥部召开了中队长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分析了敌我力量,认为:敌强我弱,不宜硬拼,决定采取“空室清野”,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利用海子地区山高林密,道路险峻的有利地形,与敌周旋,保存实力。

雨樟镇战斗打响了,国民党兴仁保警大队长兼“清剿”副指挥白雄,率四百余人在鲁础营扑空后,四处搜捕游击队员家属,把数十名游击队员家属捆在一起,作人墙打头阵,向海子进犯。当敌人到达龙张口,进入我伏击圈时,游击队员见到自己的亲人被敌人捆绑折磨,恨不得立即冲上去拼杀。这时,游击队员刘洪信的母亲赶来报告,另有一路敌人已进入海子,正向鲁础营靠拢。为了免遭敌人夹攻,防止家属伤亡,高乐同志毅然下令转移。

当敌人正以密集的子弹射向轿子山时,聂益民同志从二海子赶到坪上指挥部,传达高乐同志的命令:全部转移小桃园,所有文件带走,不能留给敌人片纸只字。何也平同志报告说,打帮农民武装正在突围中,岑廷相同志不幸被捕。指挥部立即按指定地点转移。

七月三日,我游击队转移到小桃园石洞,敌军两路在海子会合,毫无所得,又扑向裸黑,打帮。而此时,游击队又神速转移到鲁础营。当敌人赶到鲁础营时,游击队又穿过密林,回到了海子。敌人被游击队牵着鼻子在深山老林中转了七天,终于在九日撤出了海子地区。

在敌人围剿的日子里,游击队经过鲁础营、海子、轿子山、新化等地与敌人迂回一天后,大部已转移到盘县方向的大、小碧。我们三个女同志和何也平、聂益民、杨化南、陈凯等十来个同志隐藏在小桃园石洞一带。敌人到处搜索“女红军”,而我们却在群众的掩护下,坚持了五天五夜的斗争。

石洞内很潮湿,日夜站在湿地上,腿麻木了,脚浮肿了,但没有谁叫苦。夜晚寒冷时,男同志把仅有一条军毯让给女同志,女同志又把它让给体弱的同志。严重的是饥饿,敌人严密封锁,一时又与大队联系不上,有的同志饿得简直站不起来了,尽管离石洞不远,有一片绿油油的包谷地,结满了诱人的嫩包谷,但是,

没有一个同志去摘来充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除了陈凯有两枚木柄手榴弹外,我们都没有武器。然而,在这极端困难的险恶的环境里,农民群众并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困守在石洞的第三天,当地农民徐世伦冒着生命危险,辗转绕道,躲过敌人的岗哨,给我们送来了半口袋包谷花,我们接着石洞内的岩浆水充饥。

敌人撤离的前夜,当地农民龚连喜悄悄地摸到石洞,他的脸和双手,都被荆棘划满了一道道的伤痕,他默默地从背箩里端出一钵包谷饭,送到我们面前。他那纯朴的,满含着人民群众的深情的包谷饭,使我们非常激动,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了。

困守石洞已经五天了,但石洞里还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气氛。杨化南同志带了一个头,建议每人赋诗一首,以资纪念。记得端庄稳重的张大姐,胸有成竹,从容地念道:

莫叹石洞被困囚,
不举烟火胜似仙。
记取此时眼前景,
功成再会小桃园。

性格活泼的周治同志不甘落后,她念的是:

烽火轿子山,
奋力战豺狼。
论功行赏日,
莫忘半边天。

在密林,在山岗,在游击战斗中的环境中,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了日日夜夜。

冲出重围

我们在石洞被困的第五天,刘光祥同志来到石洞传达突围转移的命令:“聂益民、杨化南、陈凯三同志由海子突围,到碧蛇集中待命;何也平和我负责护送三个女同志,绕道碾场,突破封锁线,由顶效到兴义,而后转移板桥。”接着,他说:“今晚断黑出发,我打先锋,老何断后,三个女同志走中间,要听指挥,要沉着勇敢。”

天黑开始出发,三个女同志前前后后拉着一根棕绳,顺序前进。悬崖陡壁,伸手不见五指。刘光祥同志路熟,走在前面。这次行动,既紧张又艰险,尤其是我们女同志,由于生理上的特点,困难更大一些。我们克服万难,坚持前进。快到天亮时,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绕过了碾场,通过封锁线,到了查白大寨。

我们摸进地下联络员张吉昌同志家的草房,张吉昌告诉我们:离此不远,有敌保警队在寨中要草要粮。我们只好等天亮后,趁顶效赶场人多的机会,分路赶到顶效刘汉民同志家里隐藏。

到顶效后的第三天,我们到河边洗衣服。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一时麻痹,我们被清澈透底的溪流吸引了,互相泼水

嬉戏。冷不防,周治一头钻进水里,爽性游起冰来了。我和张纯急得要命,赶紧喊她上岸。这次偶然的不慎,几乎引起一场不堪设想的后果。当天晚上,刘汉民的哥哥刘汉书从街上带来了一个不利的消息:“顶效乡长吴景春在水坝上游钓鱼,看到河里有女人游泳,要立即追查!”顶效这地方是从从来没有妇女下河洗澡的,一时的疏忽麻痹,发生了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件事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教训,周治同志自己也悔恨莫及。我们只好由刘汉民同志作向导,连夜赶到兴义县城。

这时,海子游击大队大部分已顺利突围转移,没有受到损失。刘光祥同志率领的一个中队仍在海子鲁础营坚守根据地。敌人的围剿落空了。

七月初,何也平、陈凯同志由盘县转到兴义,他们是在盘普之间找到大队后,根据高乐同志指示,来兴义接应我们去云南罗平参加罗盘区政治部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当时,兴义城内外敌人四门封锁,军警密布,巡逻队日夜巡逻,气氛很紧张。我们决定冲破封锁线。

一天深夜,我们趁岗哨内的敌人疏忽之机,悄悄摸出关卡,绕过岗哨直奔罗平。在通往罗平的沿途,也见岗哨林立,封锁十分严密。我们白天翻山越岭,夜晚摸过封锁线。现在回忆起来,那情景真是万分艰险。

七月中旬,我们进入罗盘区的黄泥河,老远就听见罗盘解放区的儿童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我们赶紧从黄泥河到俞家老厂,跨过了十八连山到伊旺平坝。最后,终于到达我们朝思暮想的“山那边”——板桥。

板桥整训

板桥镇是罗盘地区指挥部和政治部的所在地。板桥市面不大,交通不便,位于南盘江上游,背山傍水,地处滇桂黔三省交界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以罗平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就是以钟山乡和板桥镇为主要据点搞起来的,粉碎了国民党多次进攻,解放了罗平、师宗、平平等县。当我们进入板桥时,正在召开庆祝沙贝差大捷和第五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会场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背卡宾枪,头戴红布五星军帽的杨江司令员和面带笑容、瘦高个子的刘清政委。这也是我参加游击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庄严肃穆的场面。

罗盘地委政治部第六期干部训练班开学了,我们海子游击队大多数指战员参加了学习。在这里还见到了何祖岳、刘兴汉、胡国铭等同志。在大家都经过严峻的考验之后,故人相见,分外亲切。还有高乐同志,我们又汇合到一起来了,他是我们的学习组长。

在学习期间,刘清政委和我们一起总结了海子失败的教训,刘清同志指出:海子暴动是在敌人的心脏里插上了一把利刃,震慑了敌人,扰乱了敌人的部署,分担了兄弟地区的压力。但是,游击队刚成立,基础不稳固,准备不成熟,发动群众不充分,暴露过早。同时,在思想认识上也有错误,把武装斗争的准备发动阶段错误地估计为发展巩固阶段,超越了客观现实的可能性,以至在强敌压境时,无法坚持。通过总结,我们较全面地认识到海子暴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九四九年八月,干训班结束。高乐、何祖岳、刘兴汉、王进之、何也平等同志,被派到贵州“盘江八属”组织反蒋武装斗争,聂益民同志调盘县游击队;胡国铭、杨化南同志调政治部文工团;周治同志分配到罗平养马寨小学教书;张纯大姐分配到罗平医务所。而我,留在干训班,参加政治部《战斗报》的工作。

干训班第十期结束时,我要求到更艰苦的环境里锻炼,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分我到师宗县工作,干训班的学员有三十多人分到师宗县,我们有五个同志由县分到八属乡工作。我和林良时(女)同志做妇女会、姊妹会的群众工作。

会师以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贵阳解放。云南卢汉宣布起义后,解放军挺进云南。二野四兵团由广西进入罗平、师宗。解放军和滇桂黔边纵罗盘三支队全体指战员,热烈会师了。春节的前一天,师宗县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陈良俊县长代表师宗县党政军民热烈欢迎解放军野战部队。四兵团政治部司令员赠送师宗县人民锦旗一面,上面写着:“由于你们的坚持奋斗,使党的旗帜永远在滇桂黔边区飘扬。”整个师宗县城一片欢腾。我们全力投入了欢迎解放军的工作,组织妇女日夜赶制军鞋,到处设茶水站。有的老奶奶提着竹篮,装满了煮熟的鸡蛋,热情地硬要塞给人民子弟兵。青年妇女和儿童团敲锣打鼓,扭起了秧歌舞。

迎军工作结束后,上级决定原属滇桂黔边纵罗盘地区领导的“盘江八属”,按行政区划交由贵州省委领导,并从罗盘地委委员、副专员王纲正同志率领,协助新区建政工作。我也是被抽调的二百名干部之一,分配到兴义县委组织部工作。不久,成立妇女联合会,我调任兴义县妇联副主任。至此,原罗盘地区的同志们,都分赴各条战线,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

作者简介:喻平,中共党员,原安顺县委离休干部,2008年去世。该文曾刊登于《回顾贵州解放》一书。

歪寨古韵

□王天锐

立冬后的天气,总是变化无常,时而的晴空万里无云,不时的阴雨绵绵洒落,让人的心情思绪万千,随气候变化飘浮不定,几位朋友相互约定,去郊外的歪寨看看,那个古朴典雅的村落,位于高原小城的边缘。

那是个晴朗的周末,几位朋友上了车后,慢慢驶出了拥堵的小城,从南站上了高速向西而去,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白云朵朵游远方,高原入冬以来,难得的好天气,从龙宫站下了高速,向么铺方向而去,田野里的稻谷已经收割,阳光高照正好的晾晒谷子。

车在原野上穿梭,转弯抹角地行驶,田野边堆叠的谷垛,像似温暖的小草屋,叽叽喳喳喧闹的麻雀,站在高高谷垛上寻食,嗡的一下子飞起,又停在了不远处,几头牛悠闲的在原野里,低着头静静地嚼食着草,尾巴左右来回的摆动,轻轻拍打滚圆的牛屁股,几只黑白相间的哥哥,飞上飞下的寻找食物。

不远处的山脚下,升腾紫色的炊烟,绿树成荫的树林,层林尽染的苍翠,一栋洁白的石头房子,若隐若现隐藏在树丛中,在树梢的上面,高高的鸟巢边,一对喜鹊叽叽喳喳叫唤,民间流传谚语,喜鹊叫贵客到。

这是个古色古香,古老的布依村寨,记得多年前,听说过这寨子,村民专程的进城登门,热情洋溢地发出邀请,也愉快答应下来,因为工作比较忙,一直没有机会去,感觉还是很遗憾,现在在这里打造成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网红打卡地,经常的上热搜。

歪寨布依语叫板歪,即树木成林的寨子,不难的想象这里,必定的郁郁葱葱,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古木参天绿树成荫,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人们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

主人站在村口边,迎接远方的客人,喝过了拦路酒,慢慢走进村寨,一栋栋石头房子隐藏在绿树之中,路边的柿子树上,挂满鲜黄的柿子,像似一个个灯笼,浸染阳光的色彩,一丛丛低矮的灌木,枝头上结满殷红的果实,让人爱不释手,轻轻摘下品尝。

漫步在古老的村落,仿佛走进古代城堡,石头房屋依山而建,街巷错落有致幽深,转弯抹角的紧紧相连,像似迷宫的路径穿梭,风化了的石头,铿锵有声

声脱落,石缝里长出墨绿的苔藓,点缀石头缝隙的希望,紫色的袅袅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来,烟消云散的飘渺,缠绵着宁静的村舍,飘逸人间烟火味道。

据说歪寨的村民,是藤甲兵的后裔,现在还会制作刀枪不入的藤甲,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时,曾经败给藤甲兵,可见英勇无比厉害,后来采用火攻取胜,七擒孟获平定南方,残存许多的遗迹,故事源远的流长。

这里山上山下路边,全是殷红棉白的石头,房门寨门用石头拱成,墙壁梯坎用石头堆垒,房屋石片代瓦的盖就,窗门户楣由石头雕凿,石头围起的院落里,摆放着石桌、石凳,墙角边有石磨、石臼,屋子里面石缸、石盆,这是石头的世界,石头的精神家园。

转过幽静的街角,在一处院落坐下,热情好客的布依人,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冲泡绿茶香茗,给大家洗尘解渴,喜笑颜开的述说今年的收成,展望明年更加美好的憧憬,唱响甜美醉人的山歌,不亦乐乎的高兴。

宽敞的院落整洁干净,墙头爬满绿色藤蔓,母鸡领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叽叽喳喳地四处寻食乱窜,羽毛绚丽的大红公鸡,站在石头上昂首啼鸣,一只黄狗从门边窜进来,摆摆高翘的尾巴来嗅,依偎地趴在脚边,任人抚触的轻抚,猫咪蹲在窗台,迷迷糊糊入睡,鸡犬相闻的宁静,悠闲舒适的时光。

村民穿上厚实的藤甲,舞刀弄枪开始表演,演绎那段峥嵘的岁月,烽火狼烟的金戈铁马。藤甲由山野里的藤茎,经过采摘晾晒风干后,再用本地的桐油浸泡,精心巧妙的编制而成,被挂轻巧藤甲,可以刀枪不入。

走出宁静的院落,漫步古朴的街巷,转过长长的街角,看见一尊尊石山,堆叠成奇形怪状的造型,夸张变形狰狞张牙舞爪,再现夜郎谷的神秘,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阐释出高原人民自强不息的永恒,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蕴,迈向更加美好的光明未来。

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走进别致的农家乐,品尝着地道的山珍野味,推杯换盏兴高采烈,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神也如此仙也如此的快活,谈古论今满嘴留香的不胜不归。



虹山湖
副刊

□苏萍 摄

多彩乡村路

愿文学之树常青

——写在《安顺文艺》200期之际

□丁杰

若干年前,如果一个人的文章写得不够好,又想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办法有三:一、花钱刊登征友启事;二、写信指出某篇文章中的错别字;三、在末尾征订时节给编辑写“读者来信”,对编辑挤眉弄眼,说贵刊(报)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云云。

想了想,算了算,从一九九一年到二零二一年,我在《安顺文艺》杂志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从诗歌到散文、从随笔到小说,前年还发过一组歌词,还没有动用过上述三条“发稿秘诀”。从编辑到主编,我都认识。但每次发稿后,我都没有在QQ空间或微信朋友圈“感谢编辑某某某厚爱云云”,因为你一感谢人家,也就把人家给背卖了:说明编辑发你的稿件是因为认识你,并不一定是你的作品很硬气。

读镇宁民族师范时,我们几个脚板上的泥巴都还没有洗干净农村娃娃,意气风发地编辑《黄果树》油印小报,自己征稿,自己排版,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最开心就是作为学生的我,破天荒享受教师待遇:到安顺办事可以算“出差”。虽然是去投稿,拿新出的《安顺文

艺》杂志,但回来后填报出差单时在“出差事由”栏填写的是“到地区文联汇报工作”。那种荣耀,是文学给的。如今,东关地区文联顶楼那位临走时悄悄问我“有没有回去的车费”的老主编,镇宁师范那位帮我在出差单上签“同意报销”的老校长,都不在好些年了。

从师范学校学生到乡村小学教师,到乡政府秘书到县报记者编辑,从乡镇干部到机关干部,从村里到镇里,从县里到市里,虽时远时近,《安顺文艺》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视野。这些年来,有时跌跌撞撞,有时昂首挺胸,其实是文学的理想和文字的温度,一直支撑着和温暖着我,让我不至低着头走路,弯着腰见人。

说起来害羞,我已经好久没有读杂志了,更别说作为内刊的《安顺文艺》。但我的书架上,我的车里,仍有几本《安顺文艺》。这么多年来,这本杂志的编辑人员名单和内文目录上的作者名字,不管怎么变换,总会有几个有我熟悉的名字。在《安顺文艺》编辑部,在朋友家里,在东门坡的旧书摊上,只要看到《安顺文艺》杂志,不管新旧,总会情不自禁地拿起来翻翻。随便翻翻后,又轻轻放回原处。像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遇到了久违的人,停下来哼唧哈哈地打个招呼,咸咸淡淡地吹几句散牛,然后,留个电话或加个微信,又各奔东西。

就像很多人从一个小村出发一样,我从《安顺文艺》出发,走到《山花》《贵州作家》《中华散文》《文艺报》,走到离安顺更远的地方。回想《安顺文艺》,想到《安顺文艺》的一些人,一些事,心里会莫名的激动。这些年,偶尔会在《安顺文艺》发文章,有时和老朋友在同一期杂志的目录上出现,就像没有相约去吃酒,却坐到了一桌,有些突然,有些激动。至于在那期杂志发表了什么文章,占了多少页码,领得到多少稿费,已不那么重要。是像吃酒,吃了几个菜,喝了几瓶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遇到了谁,醉了没有。

桂家湖少数民族文学笔会、地质大队大院报告文学改稿会、委家坡水库歌词创作笔会,都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安顺文艺》杂志的办公地点一次又一次地更换,主编一茬一茬地换,作者一茬一茬地换。随着工作的变动,时光的变

迁,我到《安顺文艺》编辑部的次数和时间越来越少,以至后来我的办公室和《安顺文艺》编辑部办公室只有不到一百米远的时候,一年也没有去坐过三五次。我们一天天变老,《安顺文艺》却越来越年轻:编辑年轻,作者年轻,文字年轻,版式年轻,思想年轻。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但文字还在,文章还在,这本叫《安顺文艺》的杂志,还在!

《安顺文艺》两百期了!堆起来,应该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高!这里面,会有多少故事啊。那些熟悉又渐渐陌生的人,那些走进我们的故事又走出我们生活的人,有的老了,有的到远方谋生去了,有的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此时此刻,请原谅我没有提到你们的名字!就像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只要文学还在,只要太阳升起,《安顺文艺》的温暖和温情,就会一直在。就像此时此刻,安顺市委大院里这金黄的、温暖的秋天的阳光,轻轻地照在我的身上。

愿文学之树常青。